



FOCUS

高层动态

2020年8月3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88.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本期目录

最新动向	3
【习近平：打造新型多边亚投行】.....	3
【习近平：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4
【习近平：任何国家任何人不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习近平：强国须强军 军强方国安】.....	6
【中央政治局：十九届五中全会10月召开】.....	7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8
【李克强：毫不放松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抓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9
【韩正：始终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	10
【胡春华：不折不扣落实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10
【胡春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更好服务稳就业大局】.....	11
【刘鹤：中欧举行经贸高层对话意义重大】.....	11
【王毅：美国蛮横无理 中国将理性回应】.....	12
问题探射	13
【城乡差距的制度根源】.....	13
【经济内循环，如何缓解四大结构性失衡】.....	16
【特别抗疫国债发行有挤出效应吗？】.....	17
人物关注	20
【省部级干部调整，信长星任青海省代省长】.....	20
智囊高参	22
【黄群慧：全球化大变局下中国工业化战略抉择】.....	22
【黄奇帆：怎么构建“国内大循环”？】.....	26
虎视寰球	37
【南亚三国面临三重困境】.....	37
华夏透视	38
【7月30日政治局会议要点解读：政策基调突出稳健】.....	38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习近平：打造新型多边亚投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月 28 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习近平向会议表示祝贺，积极评价亚投行不断发展壮大，指出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各成员要聚焦共同发展、勇于开拓创新、创造最佳实践、坚持开放包容，把亚投行打造成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与时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平台、高标准的新国际合作机构和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中国始终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继续同各成员一道支持和办好亚投行，为国际社会应对风险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2013 年年底，我代表中国提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开业 4 年多来，亚投行坚持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实现良好开局，从最初 57 个创始成员，发展到今天的来自六大洲的 102 个成员，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展示了专业、高效、廉洁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崭新形象。

习近平指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表明，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是战胜危机的人间正道。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各国应该努力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一是聚焦共同发展，把亚投行打造成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应该致力于服务所有成员发展需求，提供更多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既要支持传统基础设施，也要支持新型基础设施，为促进亚洲及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是勇于开拓创新，把亚投行打造成与时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平台。亚投行应该创新发展理念、业务模式、机构治理，通过灵活多样的发展融资产品，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绿色发展，支持技术进步。

三是创造最佳实践，把亚投行打造成高标准的新国际合作机构。亚投行要把遵循国际通行标准、尊重普遍发展规律同适应各成员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机



结合起来，创造国际发展合作最佳实践。

四是坚持开放包容，把亚投行打造成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顺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趋势，同更多发展伙伴开展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始终支持多边主义、践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同世界各国共谋发展。中国将继续同各成员一道支持亚投行、办好亚投行，为国际社会应对风险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Top](#)

【习近平：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习近平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人民群众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等最前沿，培养适应多领域需要的人才。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优化考试招生制度、学科课程设置，促进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加强国际合作，着力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7月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内涵发展。把研究作为衡量研究生素质的基本指标，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注重分类培养、开放合作，培养具有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针对不同学位类型完善教育评价体系，严格质量管理、校风学风，引导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Top](#)

【习近平：任何国家任何人不能阻挡中华伟大复兴】

7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



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调查研究，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积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和巨大压力，为推进改革发展、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力量。我们有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坚实国力应对挑战，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慧战胜各种风险考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座谈会。李克强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李卫先后发言。他们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取得的突出成就，并就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保持宏观调控战略定力、做好前瞻性政策储备，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多措并举确保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强化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科技支撑，开发就业岗位，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打造企业新生态、推动小微企业发展，加强投资管理、提高投资效益，稳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刚才，大家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意见，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

● 疫情为脱贫“加试” 各民主党派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引导广大成员积极投身医疗救助、科研攻关、捐款捐物、复工复产、建言献策等各项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家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围绕“积极推进改革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提升治理效能，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通过委托地方、运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灵活开展调研，努力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对策提实。特别是面对疫情给脱贫攻坚提出的“加试题”，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同志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掌握第一手资料，听取第一线声音，认真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 经济运行基本恢复 三四季度要乘势而上

习近平强调，现在疫情防控局势平稳，经济运行基本恢复，三、四季度要乘势而上，巩固扩大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成果，努力弥补上半年的损失。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



保宏观经济政策落地见效，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民生保障和防汛救援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最后，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 3 点希望。

丁薛祥、胡春华、尤权、王勇、肖捷、何立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和蒋作君、李钺锋、黄荣、王梅祥等。

[Top](#)

【习近平：强国须强军 军强方国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下午就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举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紧工作，奋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荣弟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重要位置，付出艰苦努力，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今年，我们将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 年目标任务，并乘势而上，开启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而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了新的战略筹划和安排。要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推进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确保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目标任务。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难得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要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努力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同国家发展布局相协调，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我军现代化发展战略，拟制好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形成科学的路线图、施工图。要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突出军事政策制度改革这个重点，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工作，不断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要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基点，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发展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加快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战略工程，不断提高我军建设科技含量。要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健全三位一体军事人



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军事人力资源管理，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延揽各方面优秀人才投身强军事业。要更新管理理念，提高战略素养，健全制度机制，畅通战略管理链路，实质性推进军事管理革命，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全党全国一盘棋，军地合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识，认真落实担负的有关工作，在国防科技创新、国防工程建设、国防和军队改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军人家属随军就业、子女入学入托、优抚政策落实和退役军人保障等方面积极排忧解难。军队要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搞好沟通协调，共同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向前进。

[Top](#)

【中央政治局：十九届五中全会 10 月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 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认为，“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会议指出，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必须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们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决策部署是正确的，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中国经济韧性是强劲的，中国人民是拥有伟大创造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 当前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会议要求，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实施步伐。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 and 锻长板。要全力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要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实施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要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做好民生保障，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疫情对青年人就业影响，引导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要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实施一批长江、黄河生态保护重大工程。要抓好应急管理，强化安全生产。要有力组织防汛救灾，精心谋划实施灾后恢复重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Top](#)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 月 2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扩大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决定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出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新举措，助力保就业保民生；为保障统筹防疫和发展，安排进一步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建设。

会议指出，稳外贸稳外资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六稳”工作部署的重要环节。要围绕稳住外贸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一是支持外贸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针对企业订单减少等突出问题，推出有效措施支持拓市场、增订单。运用出口信用保险积极保障出运前订单被取消风险。推广“信保+担保”，为外贸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持。二是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发挥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支持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业态，扩大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试点，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三是完善吸引外资政策环境。对重点外资项目一视同仁加大用地等保障。提高外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便利度。再贷款再贴现专项额度、进出口银行新增贷款规模等等支持外资企业。四是发挥服务贸易对稳外贸稳外资的作用。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扩大到全国 21 个省份部分地区，围绕拓宽开放领域、提升便利水平进行改革探索，包括发展跨境商业医疗保险、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扩大技术进出口经营者资格范围、在常态化防控下加强旅游和体育国际合作等，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会议指出，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是促进稳就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内容。一要压实地方责任，拓宽就业渠道，稳定城镇常住农民工就业。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纳农民工就业多的给予更大政策激励。灵活就业支持政策对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民工一视同仁。二要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结合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灾后恢复重建等，为农民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加大以工代赈投入，将发放劳务报酬的资金占比由 10%提高至 15%以上，吸纳更多农民工就业。增加城镇建设用地要把吸纳农民工就业数量作为重要条件。三要以创业带动就业。对农民工首次创业且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的，可先行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的一半资金。四要加大帮扶力度，优先保障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由务工地或常住地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会议指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是关键性手段。要调动各方力量，加快检测时间短、灵敏度高、操作简便的产品研发上市，加紧培训检测人员，合理布局和增加机动检测力量，在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范前提下，确保秋冬季前实现全国三级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各级疾控机构及县域内 1 家县级医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各有关方面要及时加强资金等相关保障。

[Top](#)

【李克强：毫不放松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抓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国务院安委会 7 月 31 日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总体稳定，但风险隐患增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务必高度警觉和重视，毫不放松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增强底线思维，进一步压实各方面各环节安全生产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深化各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仍处在防汛抗洪救灾关键期，要继续指导和帮助南北方相关省份毫不松懈地抓好大江大河大湖和重要水库、河流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加强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防范，周密安置好受灾群众生活，支持地方灾后恢复生产、重建损毁房屋和设施，扎实做好沿海地区防台风准备，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委员、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赵克志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加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安全风险防范，积极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深入推进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扎实开展危化品道路运输、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治理，全面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狠抓严格监管执法和事故处理整改落实，把好安全监管每一道关口。加强“十四五”安全生产规划和法规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提升安全基础保障能力。统筹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严密防范各类灾害事故风险叠加放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此前，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体会议，研究了有关工作。

[Top](#)

【韩正：始终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7 月 28 日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韩正表示，要进一步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扎实推进、久久为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韩正强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更加突出抓好重点任务、重大项目、重要政策。要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强化规划引领，加强项目前期工作，不断更新和充实项目储备库，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要推动交通一体化取得新突破，完善体制机制，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加快推进京津冀城际铁路建设，构建“轨道上的京津冀”。要研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体系，进一步明确疏解功能的大方向，疏解政策要有力度，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真正形成引导和倒逼效应。要大力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促进京津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河北延伸，不断缩小公共服务落差，让人民群众享受协同发展成果。要推动改革创新取得新突破，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努力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指导督导，把好规划落实关，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把每一项任务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李鸿忠、蔡奇、王勇、何立峰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

[Top](#)

【胡春华：不折不扣落实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全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 7 月 27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开展考核工作，全面促进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出现任何闪失。

胡春华指出，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制度安排，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起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全面抓好落实。要切实加强粮食生产，无论是主产区还是产销平衡区、主销区，都要确保粮食播种



面积和产量只增不减。要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切实遏制耕地“非农化”乱象，防止过度“非粮化”特别是“非食物化”，坚决保住中华民族的“铁饭碗”。要扎实做好粮食储备流通工作，抓好粮食收购，严格落实地方储备，增强应急供应能力。要强化对粮食安全的支持保障，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加快粮食全产业链现代化建设，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胡春华强调，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必须充分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要较真碰硬开展考核，切实做好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强化考核成果应用，确保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举措、工作都落实到位。

[Top](#)

【胡春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更好服务稳就业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近日在北京调研灵活就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稳就业放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首要位置，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大对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支持，更好服务于稳就业大局。

胡春华到互联网平台企业，实地考察招聘服务大数据平台、在线招聘直播等情况，并与部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互联网平台企业座谈，详细了解市场招聘需求、灵活就业发展等情况，认真听取对稳定和扩大就业、改进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胡春华指出，灵活就业对于稳就业、保民生意义重大。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要把支持灵活就业作为稳就业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劳动者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多渠道灵活就业。要充分发挥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作用，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改进就业服务，促进供需有效对接，切实促进就业稳定、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要适应灵活就业不断扩大趋势，研究制定相关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鼓励地方、企业大胆探索，为灵活就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Top](#)

【刘鹤：中欧举行经贸高层对话意义重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7 月 28 日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共同以视频会议形式主持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双方围绕“开启后疫情时代中欧合作新局面，引领全球经济稳健复苏增长”主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高效的讨论，就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治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世贸组织改革、扩大市场开放、数字经济、互联互通、金融和税务领域合作等达成一系列丰硕成果和共识。

双方认为，今年正值中欧建交 45 周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特殊背景下，中欧举行经贸高层对话意义重大。双方愿共同努力，认真落实好习近平主席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视频会见以及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相互理解和包容，在不确定性中创造确定性，增强市场信心，共同推动后疫情时代中欧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刘鹤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中欧作为两大主要经济体，推动全球团结抗疫和经济复苏，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洲，有利于整个世界。东布罗夫斯基表示，欧盟和中国是重要合作伙伴，推进欧中关系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Top](#)

【王毅：美国蛮横无理 中国将理性回应】

7月28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通话时就中美关系发表了看法。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忧，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出于拉抬选情的政治考量和维持单极霸权的需要，不惜全面否定中美关系的历史，毫无道理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不断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攻击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污蔑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执政党。这些行径丧失了国与国交往最起码的礼仪，突破了国际准则最基本的底线，是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如果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霸道”。

● 警惕美政客把世界引向新冷战

王毅表示，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几天发表演讲，试图重新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把世界引向一场新的冷战。世人仿佛看到已经扫入历史垃圾堆的麦卡锡主义企图卷土重来，如果任由这种阴谋论得逞，不仅中美关系将陷入对抗的深渊，世界将陷入分裂的危机，人类的前途命运也将陷入危险的境地。

王毅表示，近几年美国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在单边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再背弃自身的国际承诺和国际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本届美国政府退出的国际条约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以往任何一届政府。美国甚至在国际社会最需要团结抗疫的关键时刻，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逃避作为大国本应肩负的道义和责任。美国已经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站到了历史潮流和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王毅表示，面对横冲直撞、蛮横无理的美国，中国将作出坚定而又理性的回应。

● 中美应理性沟通维护关系稳定

首先，中方将坚决反制侵害中方正当权益的恶劣行径。中国从来不会主动挑起事端、始终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不久前，美国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发起挑衅，我们当然要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这完全符合外交惯例，也是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的应有权利。

第二，中美应当进行理性沟通。我们决不会听任少数反华分子颠覆中美几十年交流合作的成功积累，也决不会允许以意识形态偏见破坏中美关系今后发展的进程，美方肆意挑动对抗和分裂的做法同今天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的现实大相径庭，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南辕北辙。我们愿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出发，通过平等沟通交流，力争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

第三，国际社会应当共同维护团结与合作。我们相信各国都能作出正确和明智判断，不被美国少数政治势力裹挟，共同防止世界被拖进冲突对抗的新冷战，



共同防止全球化的进程被粗暴打断。纵容霸凌保证不了自身安全，反而会让霸凌者得寸进尺。各国应行动起来，抵制任何单边和强权行径，捍卫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王毅说，我们对世界的未来仍充满信心，因为任何倒行逆施都不得人心，也不可能持久，和平与合作必将成为时代和人民的选择。

[Top](#)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城乡差距的制度根源】

城乡之间的持续差距是一个事实。去过农村的人，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农民很朴实，但农村比城市落后太多。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感受会更强烈。某些贫困的农村，住房在外观看上去不错，但室内空荡无物，仅有简单破旧的家具，污水直接排到地下，解手还得上茅房。

物质差距直接导致了教育差距。好教师不愿意去农村当老师。据 2014 年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介绍，初中阶段具有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城乡之间相差 14.5 个百分点。小学阶段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教师，城乡之间相差 9.2 个百分点。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缺乏好老师，也见不到外面的世界，没读完中学就辍学，更别说考大学了。

城乡差距导致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城市里的生活成本比农村高很多，但农民依然要留下来。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约 2075 万人，约占农村在校生的 30%。农村的生活条件、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医疗卫生条件，与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农村给人的印象仍然是贫穷。

近年来，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2015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1195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422 元，城乡收入比为 2.73: 1，比 2009 年的 3.33: 1 下降了不少。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依然很大，是 19773 元，比农民收入还要多。

舆论倾向于认为，城乡差距的根源是国家向农村的投入太少。但实际上，仅从 2008 年至 2013 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 5.85 万亿元。加上地



方的配套投入，国家向农村投入并不少。社会各界向农村的投入也不小。十多年来，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去农村创业、支教、当村官，但农村的发展变化比城市要慢很多。结果是，农业补贴了，墙面刷了，道路修了，田埂拆了，农田连片了，学生下乡了，不少地区的农村依然比城市穷太多。靠增加向农村的投入来发展农村，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城乡差距的表面原因，是农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不赚钱的。多数地区的农业，包括部分地区的家庭农场，主要依靠补贴维持。种地的农民多在五十岁以上，而他们的子女愿意在城市生活。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一是因为种地收入低，又是体力劳动，非常辛苦，二是因为城里有更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城里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信息，年轻人能学到更多知识，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那些能留住年轻人的农村，要么靠旅游，要么靠工业，早脱离了农业。

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对农村功能定位的计划经济思想。计划思想在三农问题上的体现，是将生产结构与区域联系在一起。城市的定位是发展工商业，而农村只能发展农业。比如，有观点认为，“农村不是搞建设的地方，农村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提供农产品，二是提供生态环境产品，这才叫农村。农村的建筑，是农民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也就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农村的功能就是生产粮食，保证“万一”打仗时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农村的房屋，是为农民生产粮食提供居住服务的。在有序的安排下，农村和农民是为整个国家机器服务的一个部件。让农村依赖农业，农业不赚钱，农村这个部件就会一直贫穷。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既然农村是搞农业的地方，就不能随便让农村搞建设。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既有多年的规模控制（十五年的土地利用规划），也有年度计划控制。根据计划分配的土地权利资源，却又是极不公平的。计划下达的农转用指标，实际分配的方式，是按行政级别层层下发。指标到了县一级，绝大多数分配到开发区、或用于新城建设，很少到镇一级，更别说到村庄了。缺少指标，农村就没法建厂房、客栈，搞不了工业和旅游业。一些乡镇和村庄为了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只好为农民建楼房，让农民上楼，把腾出来的土地用于建设发展。

农民上楼，配上基础设施，一方面改善了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发展腾出空间，一举多得。其弊端是，对于少数依赖于农业的年长农民，种地不如以前便利了，农具没地方放了，有一个适应过程。可是，在用途管制加行政分配指标的约束下，不这样做，地方发展又能指望什么呢？眼看着农村继续破败下去吗？一些学者专家批评地方政府让农民上楼的行为，但没认识到，正是计划管理指标的制度，在迫使农民上楼。

更大的问题是农村土地市场的缺失。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导致市场制度建立不起来。市场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政府、中介、买卖双方在长期的互动中累积制度建设知识。城市的国有土地已建立了一套市场交易制度，积累了一系列市场交易的知识。但中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没有市场的，这就导致了抵押、评估、中介、仲裁等大量市场功能的缺失。市场的缺失，背后是农村产权的缺失。现行制度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不准入市交易。中介公司、评估公司、金融机构、法院也不愿意为农村土地房屋提供市场服务。农村盖的房子，出租或出让给城里人，被称为“小产权房”，不但得不到产权保护，还面临罚款、拆除的风险！产权与市场残缺的思想根源，依然是农村土地农用，农民要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做出牺牲。



近年来，除了上述计划经济的思维，部分学者又为农民的产权残缺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一种理论认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这种观念认为，“过去，农民穷，买不起商品房，因此给他无偿提供一块土地，至少可以在上面盖个房，有容身之所。没钱的农民可以搭个茅草房，有钱的农民可以盖个小洋房。这项制度仅限于本集体内的成员，原则是一户一宅。农村的宅基地是保障性住房的产物，并非商品。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益，而宅基地使用权只有占有、使用权，没有收益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宅基地之所以产权残缺，是因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剥夺产权是为了农民好！

这种理论没有认识到，一刀切的宅基地政策，忽略了农民对宅基地多种用途的需求。一是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一些农民着急用钱，看病或供孩子上学，但房子没法抵押贷款，也卖不出钱，没法解决紧迫的困难。二是有不少农民在县城里买了房子，不需要农村的宅基地作为住房保障。三是农村土地与房屋无法作为农民保值增值的财产。有些农民希望将农村的房子卖掉，换取城里更好的住房，但他们的房子卖不出价。城里人刚参加工作，一开始买不起大房子，先买个小房子，伴随收入的积累和房价的上涨，再拿小房子换取大房子。城里的住房作为一种保值增值的资产，用以抵抗通胀的压力。但农民虽有房子，却不能出让，不能以房换房。通货膨胀与城市的房价在逐年提高，农民只能依靠辛苦打工赚来的工资买房，失去了本可以利用房产增值来进城换房的机会。在发达国家，有一块土地就是财富。但在中国不少农村，农民有了土地住房，却要花钱维护，成了负资产。不少农民自愿放弃农村的住房，大量的宅基地和住房闲置和废弃。

宅基地是作为保障还是作为商品，应该由农民自己来决定。家家户户的情况不同，有的农户不需要宅基地作为保障，就不应该用政策来限制他们的财产权利。试想下面的对话：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换城里的房子。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为父母孩子治病，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扩大生产致富。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不懂金融却要代农民理财，不是很荒唐吗？

学界还为现行制度提供了另外一套理论支持，那就是资本下乡会导致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学者们忽略的，是这一套理论所基于的历史是农业社会，农民附地而生。但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农业不赚钱，农民不想种地，他们宁愿抛荒，也要不断往城里涌。种地不赚钱，如果取消补贴，不会有多少企业愿意下乡。

企业下乡，带去的不是资本，而是知识。企业下乡带去了技术、管理，和商业世界的知识。这些现代科技与商业知识正是农民所匮乏的。笔者调研过的河南土地流转案例，企业刚去农村流转土地时，村民比较朴实，要价比较低。但伴随与企业员工的接触增多，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市场知识，再转让土地时，农民学会了讨价还价，要价越来越高。农民也在为下乡企业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技术、组织等知识。这些知识，正是农民变为市民，融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企业下乡，不是资本下乡，而是知识下乡。

城乡差距的持续，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农村，那里的农民住小别墅，生活物资丰富，汽车、现代化电器、现代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居民相差不大。发达国家的土地市场比我们发达，大公司比我们多，但他们的农村也比我们富的多。农民有地而贫穷，城里人没地但富裕，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根源在土地制度，是土地产权和市场的残缺。



十几年来，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可谓投入不菲，但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还需要从观念、制度入手。需明确，实事求是的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调整，工商服务业是主体，农业已不在是基础。既有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工商业从大城市郊区向农村和内陆地区的迁移，推高了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计划配置土地指标的制度，以及对集体土地入市的限制，已不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极大的制约了农村发展、农民致富。

政策制度的实际效果，终究要靠农民来评价。一位在河北工作二十多年的乡镇书记说，十多年前还研究国家关于“三农问题”重要的政策文件，而现在，他已经不再研究了。

[Top](#)

【经济内循环，如何缓解四大结构性失衡】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体现较强韧性。二季度 GDP 增速重新回正至 3.2%。根据 IMF、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20 年全球 GDP 将下滑至-5%，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然而，疫情助推逆全球化，随着疫情后快速反弹结束，经济可持续复苏需要重视四大结构性失衡，即需求恢复慢于生产、三产恢复慢于二产、中小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以及实体与金融冷热不均。下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应对，缓解四大失衡是助力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关键。

● 四大结构性失衡制约经济复苏

一是供需的不平衡，即生产恢复快于需求。6 月，生产端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4.8%，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而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有-1.8%，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外需方面，尽管二季度出口韧性尽显，但除了防疫用品、在线设备等品类出口大增外，其余主要商品均有明显回落，未来产业链转移仍是潜在风险。在此情况下，内需更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需要尽快破局。

二是行业的不平衡，即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二季度，第二产业 GDP 增速大幅反弹 14.3 个百分点至 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 7.1 个百分点至 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从月度数据看，6 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同比 2.3%、1-6 月累计同比-6.1%，恢复速度显著滞后于工业生产。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就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一失衡也将对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三是企业的不平衡，即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6 月限额以下企业社零增速为-1.4%，连续四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表明新冠疫情对于中小零售企业造成了更为明显的负面冲击。

此外，制造业 PMI 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而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 60% 以上的 GDP 和 80% 以上的城镇就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全力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是重中之重。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爆发后，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一季度 GDP 下滑 6.8%。面对这一局面，政策当局果断



应对，引导金融体系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6月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社融存量同比分别升至13.2%和12.8%，自2月以来大幅走高；上半年金融业GDP增速为6.6%，较整体高出8.2个百分点。近期火爆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虽然经济逐步改善，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这也放大了实体与金融的失衡。

● 打造经济内循环更需结构性改革

在疫情反复不断、外部形势恶化的背景下，叠加四大结构性矛盾的掣肘，中国经济的复苏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如果政策能够针对上述结构性失衡问题对症下药，将有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首先，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以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多种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可选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同时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

其次，随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发挥民营经济就业“稳定器”作用尤为重要。对此，应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资金链压力。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就是支持金融直达实体经济、落实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

再次，鉴于疫情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民营企业经营和偿债的冲击存在差异，应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将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有针对性地实施到位，对前期经营状况较好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给予更多倾斜；同时，推动银行机构补充资本，利用好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最后，更加注重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是货币政策要稳定市场流动性、尽快推动降成本；二是金融信贷政策在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特殊时期不抽贷、断贷、压贷，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同时，也应前瞻性做好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三是财政政策在企业减负的同时，需要重视加大对于政策性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避免风险积聚。

除此之外，近年来结构性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通过缓解结构性矛盾，发挥内需潜力，释放潜在动能，实现更加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比如，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Top](#)

【特别抗疫国债发行有挤出效应吗？】

全国两会之前，赤字货币化问题在业界曾引起了广泛讨论。主张赤字货币化的理由之一是，担心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可能会对市场产生挤出效应，故建议由财政向央行直接发行。实际的情况是，1万亿元特别抗疫国债发行规模远低于市场



主流预期且采取了市场化发行方式。现在我们可以基于事实来考察特别国债是否有挤出效应。

● 特别国债发行增加全球安全资产供给

据财政部介绍，截至7月16日，抗疫特别国债已发行12期，累计发行7200亿元。财政部表示，特别国债发行利率平均为2.75%，与国债二级市场收益率衔接良好；债券认购需求旺盛，平均投标倍数（实际投标量/计划发行量）达2.63倍，较6月以来一般记账式付息国债高0.1倍；市场普遍认为发行透明度高，节奏较为均衡，维护了债券市场平稳运行。

笔者对截至7月24日8600亿元特别国债的发行情况分析结果显示：一是第三期和第四期10年期特别国债分别自6月24日和7月16日开始计息，票面利率分别为2.77%和2.86%，反映了5月份以来二级市场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的影响；二是各期限特别国债票面利率持续低于前5个交易日二级市场的日均同档国债收益率；三是较1月份二级市场的日均同档国债收益率则低得更多，即便5月份以来市场利率有所反弹，二者负偏离程度与其间政策性利率下调30个基点的幅度也大体相当。

在主要经济体普遍实施零利率、负利率，全球负收益率国债存量十多万亿美元的情况下，人民币特别国债发行增加了全球安全资产供给，获得了境外投资者的青睐。据统计，美国债券发行中，国债发行通常占到1/3左右，而中国通常不到1/5，今年6月份也才占到31%。今年二季度，中国记账式国债发行17988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1.45倍；记账式国债托管存量增加9359亿元，境外投资者净增持（记账式）国债1487亿元，占记账式国债托管存量增加额的15.9%，其中6月份该项占比为9.1%，远低于二季度的平均水平，显示当月境内主体购买国债更为积极。到二季度末，境外机构持有记账式国债占比为9.1%，环比提高了0.4个百分点，同比提高了0.8个百分点。

据外汇局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境外净增持境内债券596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今年一季度，全球新增人民币外汇储备57亿美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占比达到2.02%，人民币外汇储备绝对额和市场份额均创历史新高。人民币债券资产的新兴避险角色初步显现。

● 特别国债发行未影响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

截至6月底，中国广义货币供应M2同比增长11.1%，增速环比基本持平，同比提高了2.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8%，环比提升0.3个百分点，同比提高了1.6个百分点。这符合政府工作报告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中提出的“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融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的目标。

诚然，如前所述，为保证特别抗疫国债发行，财政部门对于政府债券发行节奏进行了调节，将地方政府债和一般国债发行给特别国债发行让路。据中债估值中心统计，6月份，记账式国债发行6849亿元（含29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发行），环比增加了75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2867亿元，环比减少了10158亿元。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别国债发行对地方政府债发行有阶段性的挤出效应。

但是，从6月份社融存量变动的角度看，一是社融规模净增加2476亿元，



环比多增 1634 亿元；二是人民币贷款余额新增 3527 亿元，环比多增 4264 亿元；三是企业债券融资存量新增 504 亿元，环比多增 6859 亿元；四是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新增 185 亿元，环比多增 147 亿元；五是政府债券融资存量减少 3912 亿元，环比少增 1.19 万亿元。也就是说，特别国债发行对地方政府债发行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对企业债发行没有挤出效应；当月企业和政府债券融资余额合计减少 3408 亿元，但新增人民币贷款基本抵补了这部分降幅。

业内主张赤字货币化的另一个理由是，央行今年以来资产负债表总体趋于收缩，有流动性陷阱之虞。然而，这种观点似是而非。

首先，从央行资产角度看，虽然到今年 6 月底较上年末收缩了 7199 亿元，其中对银行债权减少了 6130 亿元，但较上年同期仍增加了 336 亿元，其中对银行债权增加了 9758 亿元。后者反映了疫情应对以来，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再贷款再贴现等操作，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

其次，从央行负债角度看，到今年 6 月底，央行基础货币较上年末减少 1.58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747 亿元。无论环比还是同比，央行都是在缩表。但是，基础货币的减少主要反映了同期央行多次降准的影响，货币乘数由去年 6 月份的 6.14 倍升至今年 6 月份的 6.92 倍，支持了同期 M2 增速的显著回升。

再次，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为明显，这是维持疫情冲击、经济停摆情形下，企业现金流、资金链不断的客观需要。但是，“三期叠加”中的“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殷鉴不远，现阶段仍需对杠杆率的过快提高有所控制。因此，如果说当前杠杆率上升是适度的话，则赤字货币化很可能需要央行减少其他渠道的货币投放。正如当年外汇占款增长过快，令央行不得不以发行央票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方式进行对冲操作一样，这才是显性的挤出效应。

● 近期利率上行反映了健全货币政策框架的迫切性

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加强监管，打击资金‘空转’套利”的工作部署，5 月中下旬以来，央行货币政策边际上有所调整。在政府债券供给增加的情况下，降准降息的市场预期一再落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持续走高，这一定程度推高了第四期 10 年期特别抗疫国债的发行成本。市场由此可能对于 6 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引导债券发行利率下行”的工作部署产生了困惑。

实际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季度例会在重申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的同时，还提出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显然，打击资金空转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现实需要。

中国央行已建立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的调控机制，两个“支柱”各有侧重。从国内外实践看，“退空转”更多应该是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政策的任务，货币政策目标重点还应该是增长、就业和物价目标，中国还包括国际收支平衡目标。否则，如果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来应对资产泡沫风险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各项政策叠加还可能加剧资产价格震荡。

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推进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变，需要加快完善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形成机制、调控机制和传导机制。其中，加强央行与财政的协调配合，增加国债数量供给、丰富国债期限结构，是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健全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是完善央行货币调控的需要，也是扩大金融开放的基础工作。最近路演时，境外投资者就多次追问，到底应该通过观察哪个利率来观察货币政策动向的问题。



至于财政赤字问题，在目前国债发行有市场需求且成本可控的情况下，理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清财政与金融的功能边界，解决财政赤字的显性问题，可能比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更为迫切。

[Top](#)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省部级干部调整，信长星任青海省代省长】

● 信长星任青海省代省长

8月1日上午，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任命信长星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省长。

信长星，1963年12月生，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人社部副部长等职，2016年任安徽省委副书记，近日已任青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原任青海省省长的刘宁近日已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 赵一德任陕西省政府党组书记

7月31日下午，陕西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赵一德主持。据了解，这是赵一德首次以陕西省政府党组书记职务公开亮相。

赵一德，1965年2月生，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等职，2018年任河北省委副书记，近日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原任陕西省政府党组书记的刘国中近日已任陕西省委书记。

● 罗强、李刚任四川省副省长 王凤朝不再担任

8月1日上午举行的四川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罗强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决定任命李刚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决定接受王凤朝辞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



罗强，1963年10月生，曾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等职，2017年当选成都市市长。近日，王凤朝已任成都市代市长，罗强不再担任市长职务。李刚此前担任四川省发改委主任。

● 张韶春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副书记

7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在呼和浩特会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自治区省委常委、秘书长、政府党组副书记张韶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据了解，这是张韶春首次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副书记身份公开亮相。

张韶春，男，1963年8月生，曾任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六安市委副书记、市长，2018年调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19年任内蒙古自治区省委常委、秘书长。

● 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出任河南省副省长

2020年7月31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任命：王战营同志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王战营，男，1965年2月出生，此前担任商丘市委书记。

● 曹立军任四川省副省长

7月31日下午举行的四川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省长尹力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任免案，决定任命曹立军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曹立军，1972年11月出生，曾任长沙市副市长，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等职，2017年任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近日调任四川省政府党组成员。

● 王凤朝任成都市代市长 罗强辞去市长职务

7月31日举行的成都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罗强辞去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报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备案；表决通过了《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任命王凤朝职务的议案》，决定任命王凤朝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决定王凤朝为成都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王凤朝，1965年12月生，曾任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去年9月起任四川省副省长，近日任成都市委副书记。罗强，1963年10月生，2017年1月当选成都市市长。

● 刘国中任陕西省委书记 胡和平另有任用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刘国中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同志不再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刘国中，男，1962年7月出生，此前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胡和平，



男，1962年10月生，2017年10月起任陕西省委书记。

- **李伟任吉林省副省长**

7月30日，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任命李伟为吉林省副省长。

李伟，男，1970年9月生，汉族，河南南召人，中共党员，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局局长、中央企业团工委书记，国资委企干一局局长等职务。

- **福建南平市市长刘洪建出任云南省副省长**

7月29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刘洪建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刘洪建，1973年1月出生，长期在福建省工作，曾任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等职，2018年任南平市市长。

[Top](#)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黄群慧：全球化大变局下中国工业化战略抉择】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形势波谲云诡，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还十分突出，深化工业化面临着巨大的新挑战，中国工业化战略也面临着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的转变。

- **“去工业化”趋势的挑战**

发达国家工业化经验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收入呈现“倒U型”的关系，



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人均收入不断提升，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制造业就业占比和增加值占比就会下降。20世纪60年代以后，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约减少了2500万个岗位，欧盟国家制造业就业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一，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逐步降低，这被认为是“去工业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发国家相对于早期工业化国家而言，会呈现出在更低的发展水平出现“去工业化”的典型特征事实。如果说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制造业所带来的创新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都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服务业效率提高能够承担支持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时制造业占比降低被认为是“成熟去工业化”。反之，则是“过早去工业化”。如果说存在相对于“成熟去工业化”一段时期制造业占比下降速度过快，这可以被认为是“过快去工业化”。“过早去工业化”或者“过快去工业化”，取代制造业的可能是低技能、低生产率、低贸易度类型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无法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来替代制造业，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极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十三五”期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已从2015年的29.3%下降到2018年的27.6%，同期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42.2%提高到46.3%。第四次经济普查的结果显示，2018年法人单位和个体户工业企业从业人员13195万人，比2013年末下降11.96%，而制造业从业人员减少了1344万人，占工业从业人员净减少量的75%。虽然第二产业和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我国工业比重的下降既有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也有经济“脱实向虚”的不利影响，呈现一种“过快去工业化”倾向。

基于国际上的经验，多数文献基本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以及“过快去工业化”问题，而近些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日趋严重也强化了对应的判断。课题组具体选取了全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占比从2010年到2017年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70个地级市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的城市出现了“成熟去工业化”的现象，69个地级市辖区人均GDP未达到10000美元的城市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

我国作为一个还未全面实现工业化、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避免“脱实向虚”，并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一个合适水平。中国人均GDP为1万美元的发展水平并参照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制定的25%的目标以及韩国接近28%制造业比重，在2025年之前的整个“十四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应保持在大约30%的水平为宜，到203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至少应保持在25%以上。

● 全球化大变局的挑战

中国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中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深度参与了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在促进自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推动了全球包容可持续工业化进程。2009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与2005年相比，我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提高了13.2个百分点，比重翻了一番有余，而所有工业化国家则下降了14.3%。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22个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4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一，7个行业居世界第二，1个行业



居世界第五，有些行业的增加值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的国家。

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全球化也出现了一些大变局，全球价值链出现了重大结构性调整趋势。基于合作、互惠、协商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规则正在受到侵害，多边主义贸易体系正在受到严重挑战，WTO 的效率和权威性受到极大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势力正在增强。

OECD 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虽然回流尚未取代外包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导范式，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新增投资流向了发达国家。同时，尽管全球价值链的总体参与度仍在提升，但其增速却大幅下降。2000—2010 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平均增速达到 11%，2010—2017 年急剧滑落为 1%，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则由 13% 降至 3%。随着全球价值链扩张态势逐步停滞，区域价值链分工作用日益凸显，也正在重塑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区域内“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谈判日益增多。

但有经济学者提出了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形”——超级全球化、民主政治与国家主权不可能同时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无”从长远看不可持续。在全球化大变局中，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美国单边主义的贸易政策正在打破基于高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这将对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普及促使本土劳动生产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不断被削弱。同时，页岩油技术革命让美国能源成本大大降低，由石油进口国转而成为世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发展中国家能源成本优势逐步难以持续。此外，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刺激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大力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本国企业的资金成本，同时降低企业的综合税负。加之“再工业化”的“创新政策”支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环境得到巨大改善。

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深度工业化形成了高端打压的竞争态势。加之我国国内产业转型提速，综合成本攀升，据课题组测算 2002—2017 年，多数制造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幅达到 5—7 倍，而同期劳动生产率总体只增长 4 倍，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明显弱化，加速了我国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转移，来自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使得我国一直以来快速、低成本的工业化战略难以持续。

这种全球化大变局对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会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要在坚决维护多边主义治理机制前提下，使未来工业化战略能够引领和适应这种全球化大变局。

● 新工业革命的挑战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工业革命一直在孕育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工业革命呈现出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等特征。

面对新工业革命的世界性趋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成为大国角力的竞技场。虽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实力增强，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主要工业强国依托各自传统优势，也在不断夯实新经济的产业基石。这都传递



出清晰的政策信号：工业大国将进一步强化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等领域的政府作用，加大创新投入、融资支持等正向手段与针对竞争对手的投资审查、高技术出口管制等非关税措施并用，确保赢得新工业革命的产业竞争。

从近几年发展趋势看，“十四五”时期 5G、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已经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战场，也必然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主战场，5G 是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底层技术，而人工智能将大大提升 5G 的商业应用价值，大大提高工业的研发效率、生产效率、工程化效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成为改变制造业形态和结构的最重要动力。未来 5G 及其商业应用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新动能。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发展 5G 和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而美国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打压中国企业、破坏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和技术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加强强化其技术和产业优势，给中国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深化工业化进程带来极大挑战。必须看到，新工业革命给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巨大的机遇，但这种机遇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必须积极迎接这种挑战，在这种大国博弈中深化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转向高质量工业化战略

面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及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的“去工业化”趋势、全球化大变局和新工业革命的重大挑战，深化中国工业化面临着新的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即我国需要推动工业化战略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

高质量工业化战略一定体现出五大发展理念要求，具有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需要、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实现从高速度工业化进程向高质量工业化进程的转变，实施高质量工业化战略，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工业化动力转变。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高质量工业化要求实现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无论是应对全球化之大变局，还是迎接新工业革命挑战，都需要提高创新能力。这要求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立工业化的创新驱动机制，促进中国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进而形成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二，围绕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工业化进程。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我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但我国还不是实体经济强国，从企业、产业和产品各个层面我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都有待提高，这还加重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去实向虚”倾向。因此，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向高质量工业化进程转变，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上，这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要求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也要求以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为核心。

第三，实现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高质量的工业化进程，必须是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坚持把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牢牢把握信息化这个大的创新发展方向，推动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技术创新和扩散；把握融合



创新发展大趋势，以融合创新促进“四化”协调发展。融合创新发展要求重视对通用和共性技术的创新，重视对通用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当前制约我国融合创新发展的主要是竞争前技术的共性技术供给不足，复合型人才缺乏，“四化同步”发展要求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化导向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有利于提升“四化同步”水平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第四，以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为先导推进可持续工业化。绿色制造将绿色设计、绿色技术和工艺、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绿色供应链、绿色就业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实现环境影响最小、资源能源利用率最高，获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优化。绿色制造对于绿色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重要支撑部门。因此，推进高质量工业化，一定要通过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壮大绿色企业、强化绿色监管等措施构建现代绿色制造体系，进而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的可持续性。

第五，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工业化进程的包容性。协调各区域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有效流动，化解资源配置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是工业化进程包容性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区域布局的基本内容。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分中，首先重视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无疑对提高中国工业化进程包容性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保护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效推进，资源要素在各区域配置更为合理，区域要素供给质量不断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区域布局将逐步形成。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Top](#)

【黄奇帆：怎么构建“国内大循环”？】

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

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一、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

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

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

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



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

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 14 亿人口、4 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 1 万至 3 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二、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一）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涵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



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 GDP 的 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 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 15%~20% 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 5% 提高到 15% 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

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 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 IPO 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 5G 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海量投资。其中，5G 基站将会有 500-600 万座，每座 50 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 1000 万台服务器。这 1000 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 1 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 5 年将至少有 30-50 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 2-3 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 2020-2025 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 10 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 24.9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 2005 年的 49% 提升至 2018 年的 79.5%，占 GDP 比重由 2005 年的 7% 提升至 2018 年的 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 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

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 90 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 10% 的效率，就会产出 9 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以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 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 5G 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



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既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

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简单的把东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西部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于西部的资源禀赋。

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 10 万平方公里（1.5 亿亩，每亩 1 万元产值），将会产生 1.5 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

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 1.5 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裕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裕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已经突破 1 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 亿中等收入群体和 6 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 45% 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20%、发展中国家 15% 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 25% 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 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 45% 降到 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 80% 的小微企业吸纳了 70% 的就业。2018 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注：2018 年 7 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 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0 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 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

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够外，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来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 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块表现为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 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559 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 43.9%，比 2015 年提高了 3.7 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



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平米；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注：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欧美资本在这条技术路线上深根多年，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综合成本。这条技术路线也被欧美资本带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这条技术路线后又对原油天然气产生了深度依赖。我们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这种“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贸易”所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得不采用这个技术路线。】。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



是“过剩”的。

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 8-10 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 2-2.5 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具有竞争力。

（六）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 3 月 3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 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 58.7 万亿元，99% 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 10 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 10 万亿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 10%，每年就会有 1 万亿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 10 万亿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 20 多万亿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 GDP 水平的 15%，而美国只有 GDP 的 7%，欧洲、日本在 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 10% 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 9.5%，公路、水路分别占 74.3% 和 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 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 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 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 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 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全方位一体化，值得我们借鉴。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 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 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三、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 WTO 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 SDR 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建议在未来 3-5 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 7.5%逐步降到 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 2020 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 40 条减至 33 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 37 条减至 30 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 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八个方面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 18 个自贸区和 1 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抓住机遇加快 FTA 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 FTA 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 BIT 谈判、中英 BIT 谈判，适时启动加入 CPTPP 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 FTA 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黄奇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

[Top](#)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南亚三国面临三重困境】

6月以来，南亚地区进入季风雨季，持续降雨引发大规模洪水和地质灾害。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日前发表公报说，印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正同时遭受洪灾、新冠疫情、经济社会危机三方面冲击。

孟加拉国国家灾害应对协调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目前该国已有近半数的行政区遭受洪灾，超过500万人受灾。流经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等主要河流和支流给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东部的比哈尔邦带来巨大破坏，阿萨姆邦目前仍有165万人受灾，比哈尔邦有超过240万人受洪灾影响。山洪和泥石流也给尼泊尔陆上交通造成严重障碍，不少交通要道无法通行。

《今日印度》日前报道说，相比肆虐的洪水，更让人担心的是如何控制新冠疫情在灾民救济点蔓延。在阿萨姆邦，流离失所的民众聚集在政府设立的救援营地，在那里几乎无法有效预防疾病传播。

印度卫生部7月3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度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63万例。据印度媒体报道，随着印度全国大部分地区解封，人员流动增加、应对举措不力，使得疫情加速向中小城市扩散。



孟加拉国卫生部门 7 月 30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3 万例。尼泊尔在 7 月 22 日结束全国封锁后，疫情出现反弹，截至 7 月 30 日，该国确诊病例总数已接近 2 万例。

新冠疫情沉重打击印度经济，印度 6 月的失业率维持在 10.99% 的高位。野村证券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疫情已严重冲击印度的需求端和供给端，预计本财年印度经济增长将萎缩 6.1%。

新冠疫情和洪灾双重影响，给孟加拉国社会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压力。孟加拉国长期报道农业领域的知名媒体人萨拉杰说，该国大面积农田遭受洪灾，未来三个月，该国粮食供应可能受到影响。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报告警告说，尼泊尔近三分之一原本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人口现在面临因丧失生计而滑落到贫困线以下的风险。

[Top](#)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将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7 月 30 日政治局会议要点解读：政策基调突出稳健】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我们对以下几个方面做重点解读：

形势判断：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首先，此次形势判断更为积极。作为对比，4 月 17 日政治局会议强调两个“前所未有”，即疫情冲击前所未有，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而本次会议则提出“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一方面，二季度以来国内疫情虽小有反复，但总体已处于稳定控制状态；另一方面，二季度 GDP 同比达到 3.2%，高于市场普遍预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正增长（根据刚刚公布的数据，二季度美国 GDP 环比下降 32.9%，同比下降 9.5%）。

二季度经济形势好于预期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二季度尽管消费仍是负增，但投资及时顶了上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达到 5 个百分点。二是在防疫物资出



口大增等带动下，二季度出口意外强劲——二季度我国出口同比增长 0.1%，而同期全球整体出口降幅达到两位数。由此，净出口对二季度 GDP 增长形成 0.5 个百分点的正向拉动。

本次会议强调“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性较大”。这主要是指当前境外疫情仍在加速蔓延，输入性病例很难完全杜绝，国内个别地区疫情还会不时出现反复。这一方面会带来外需下滑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制约下半年国内经济复苏进程。此外，当前中美关系波折不断，近期紧张态势有所升级。11 月美国大选之前，民调处于明显下风的特朗普有可能在中美关系上再启事端。值得一提的是，两国经贸官员将在 8 月通话，评估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执行进展——受疫情影响，协议中关于扩大美国商品进口额部分存在序时进度滞后情况。

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今年目标任务有两个焦点：一是在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在疫情冲击下稳定就业市场。这意味着尽管今年未设定具体经济增长目标，但 GDP 仍然要保持一定增速。考虑到二季度以来的经济修复进度，我们判断下半年 GDP 增速有望逐步向 6.0% 的潜在增长水平靠拢，全年经济增速将达到 2.5%。这将能确保小康目标中“GDP 十年翻一番”目标基本完成，同时也能对完成全年就业目标提供基础支撑。

今年底线思维突出体现在“六保”之中，而稳就业则是“六稳”和“六保”的首要关注点。伴随毕业季来临，下半年就业压力会有所加大。预计下一步宏观政策会加大对稳就业的支持，各地财政有望增加稳岗招工补贴规模，引导信贷、社融重点流向就业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定向政策也可能出台，以确保完成全年新增 900 万以上的就业岗位目标，缓解疫情对大学生、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宏观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房地产调控重申“房住不炒”。据测算，今年包括政府性基金、养老保险等在内的广义财政支持力度接近 11.6 万亿。其中上半年投放 4 万亿，下半年投放规模会增加至 7.6 万亿。资金规模上来后，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要及时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形成实物工作量，其中一个观察点就是基建投资增速。我们判断，继二季度基建投资同比转正（6.0%）之后，下半年在资金更加充裕背景下，基建投资有望实现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

关于“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意味着下半年 M2、社融增速会较为温和，将分别处于 12% 和 14% 以内的“合理增长”区间，从而显著低于 2009 年和 2015 年的两个货币扩张周期。另外，本次政治局会议未再提及降息降准，意味着下半年动用这两项政策工具的概率在下降；即使实施，降息降准幅度也会明显低于上半年，“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将主要由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体系让利 1.5 万亿完成。

不过，我们同样认为，下半年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这体现在本次会议强调“宏观政策加强协调配合”方面：考虑到下半年财政发力需要低成本融资支持，当前市场资金利率存在小幅下调空间；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启动后，信贷、社融等配套资金也需要及时到位，才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最后，“精准导向”显示下半年信贷、社融将主要流向以制造业、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部门，城投、房地产融资会受到一定控制。这也是“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内在要求。预计下一步监管层会重点挖掘“直达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潜力，其中围绕央行再贷款，还可能推出新的政策工具，精准



引导信贷资金流向。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大水漫灌的必要性。

本次会议重申“房住不炒”，与7月24日房地产工作座谈会内容相衔接，表明在经历明显修复之后，下半年房地产调控风向趋紧，整个行业不会出现高歌猛进态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压住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不过，今年稳增长仍需借重房地产投资，地方政府也需要增加土地出让金收入来缓解支出压力，因此下半年无论是房地产投资还是商品房销售，都会保持一定增幅度，全年主要房地产行业指标仍有望高于上年。

需求端：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克服疫情影响，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在复工复产顺利推进过程中，二季度经济修复的一个不足是终端需求明显偏弱。在GDP同比转正的背景下，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仍是负增（-3.8%），食品之外的普通商品价格持续走弱。本次政治局会议对此予以关注，提出“扩大最终消费”。这既符合提升内循环主体地位的中长期方向，也能缓解短期增长动力不均衡问题。我们认为，继上半年重点支持企业之后，下半年政策上有可能加大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支持力度，重点会向边际消费倾向更强的低收入阶层倾斜。具体政策可能包括加大财政定向补贴力度，鼓励各地更大规模发放消费券，以及在健全疫情防控机制过程中，逐步放开旅游、娱乐等服务消费限制等。

总体上看，本次政治局会议对当前形势判断更为积极，未来工作部署突出强调已有政策措施的具体落实，而非“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体现了对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预测若下半年外部环境、特别是外需出现较为明显的不利走势，国内宏观政策还会保持高度灵活性，通过及时对冲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当前我国无论是在货币政策还是在财政政策方面，都留有充分的发力空间。

[Top](#)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